



这两天,你是否被一篇名为《皇帝看了要崩溃:清代垃圾奏折集锦》的文章刷屏。作者把清代皇帝和大臣之间一些五花八门、奇奇怪怪,甚至是鸡毛蒜皮的奏折都扒了出来,大家一窝蜂地在一旁看笑话,并把这些奏折称之为“垃圾奏折”,甚至嘲笑写这些奏折的大臣为“蠢臣”。不过,细看历史,就会发现这些想当然并不靠谱。

只有清朝才有奏折

如今的古装电视剧,不管背景设置在哪朝,只要是皇帝处理政事的镜头,龙书案上总会放上一堆奏折。其实历史上,这种情景只会在清朝出现,因为奏折制度是清代独创。

清朝立国之初,沿用明朝制度,官员上奏文书主要有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,其中,上奏公事用题本,私事则用奏本。

在明朝,无论是题本还是奏本,都是公开的。按照程序,这两种本章都是由通政使司进呈,内阁大学士先“票拟”,即写出内阁对这件事的意见或者建议,然后将带有意见或者建议的题奏本进献给皇帝御览。

这种制度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权对皇权的约束,却有两大弊端:一是题奏本从成文到执行的程序太繁琐,运转复杂;二是由于经手的人多,不利于保密。

清朝入关之后,顺治皇帝有感于题奏本的弊端,于是创立了奏折制度。这种制度下,具奏人可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直接送入内官,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,然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,中间不必经过机构转手。既速且密,有利于皇帝的专制独裁,故能沿袭下去。

不过在顺治时期,奏折还只是一部分满族贵胄的特权,并没有大面积在朝廷推广。康熙帝继位之后,为了洞悉下情,监视官员,逐步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,从满族官员到汉族大臣,从地方督抚到京城高官,都有权力向皇帝上奏折。

雍正则不仅对康熙大力推行的奏折制度继续推广,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奏折的保密性。如宫中制作皮匣,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,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等。

乾隆初年,以密折奏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,乾隆十三年奏本取消后,奏折遂与题本一样,成为清朝的官方文书。

奏折使清帝成为独裁者

康熙初期,有权力上奏折的大臣还比较少,多是在京衙门或在京官员。大臣们往往选择在“御门听政”时,当面将奏折递交皇帝。对于外地想给皇帝上奏折的大臣,康熙允许他们派亲信家人直接送到皇官,再由内廷奏事处呈送给康熙亲自拆阅。

康熙四十九年以后,由于地方督抚大员已普遍具有以密折奏事之权,奏折自然也就多了,这就出现了一个奏折的递送问题。为了减轻具奏官员的个人负担和及时接到他们的奏报,清廷决定各地具奏折的官员可以派家人骑驿马递送奏折,并且从此成为定制,直至清代灭亡。

康熙时,皇帝接到奏折之后,要迅速进行批示。奏折在批示后,要发给具奏人或者原差带回。到了雍正时,由于军机处的设立,奏折经皇帝批示之后,除去留中不发的,均要交给军机处录副本存档,待军机处处理完毕,再将原折交给具奏人或者经过兵部的捷报处退回具奏人。

雍正皇帝为了防止奏折内容外泄,

还制定了朱批奏折的追回制度。凡是经过皇帝朱笔批示过的奏折,在发回具奏人执行之后,必须在当年年底之前收回到皇官保存,违者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

从以上奏折的处理环节,我们可以看出,清代奏折制度,使得下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上达,周转时间大为缩短,办事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。清代皇帝也借此摆脱内阁等机构对皇权的限制,将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,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。

写搞笑奏折的不是蠢臣

既然奏折这么重要,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看起来很“搞笑”的奏折呢?比如网上“曝光”的奏折:

直隶总督: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地6月初下雨的情况。

康熙:已经回复过了。

福建水师提督:禀告皇上,台湾有个妇人拾金不昧。

雍正:已读。

……

其实,奏折按其内容可分为奏事折、奏安折、谢恩折及贺折四类,其公文程式各有不同。

奏折最初主要用作请安致贺,以后逐渐用作奏事、谢恩,尤以奏事折为最多。网上所说的那几封“垃圾奏折”,大体上就属于奏事折和奏安折。而我们所看的那些比较搞笑的内容,其实是他们所上奏折的一部分,人家做正事的内容,根本没有截取出来。比如,那个上芒果的闽浙总督满保,人家可是康熙三十三年进士,后来选庶吉士,授检讨。累迁国子监祭酒,擢内阁学士,直经筵。

康熙六十年,满保指挥南澳镇总兵蓝廷珍、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率水师,以功加兵部尚书。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以后,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。朱一贵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,起义被平定,康熙对满保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。

台湾纳入清朝版图,是康熙的武功之一。进献台湾土特产,本身含有地方归化中央的意思。作为执掌一方的朝廷大员,满保不至于昏聩到一而再再而三去刺激康熙对芒果的无感。事实上,在此之前,康熙已经多次表示过,“蕃酸(即芒果)朕一次未见过,曾欲看看”,“番模(即芒果)从来未见,故要看看”。皇帝有这个强烈的诉求,满保才会一再进献芒果。不仅如此,他还把芒果树进呈到了北京,康熙命人将这些树苗遍植京城。在这之后,皇帝过了新鲜感,才对满保说“京城各处均已种植,不必再进”。

再如那个刷屏汇报雨情的赵弘燮,更是厉害,他的父亲赵良栋,曾在金庸先生的《鹿鼎记》中出现过,被韦小宝称之为“有本事之人”。赵弘燮历任山东布政使、河南巡抚、直隶巡抚。调任直隶巡抚十年后,加总督衔。康熙即位之后,为了掌握全国的农业情况,命令各地都要按时向中央报告天气状况、作物收成等情况,诸如康熙的重臣曹寅、李煦等都向皇帝汇报过。而这其中,赵弘燮无疑是佼佼者,他在奏报雨雪、蝗旱、收成等方面认真仔细,这也成为他官运亨通的主要原因。

自1979年在家乡广东大埔县建第一所田家炳中学开始,田家炳的名字就和中国的教育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如今,在网络地图里搜索“田家炳”,会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点。从辽阔的黑土地到南部沿海,几乎每个省都分布着以田家炳命名的中学、小学、书院,还有那高校里数不清的田家炳楼。有人说,得知其他著名人物去世,是由于媒体的推送,而这位老人去世的消息,则来自朋友圈里一个个从田家炳楼走出的学生。

对很多人来说,田家炳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熟悉在于,这个名字就挂在教学楼上;陌生在于,其人其事不为人知,以至于不少学子因为学校的田家炳楼而一度将他当成校友。

这确实是个美丽的误会,田家炳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。16岁时,田家炳的父亲去世,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,刚读到初二的他只能辍学接手父亲的砖瓦窑生意。幼年失学成为田家炳此生最大的遗憾。此后,田家炳在印尼生活了二十多年,也走过欧洲一些国家,他发现,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普遍素质高,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。

为了提升国民素质,田家炳从教育入手。干企业的田家炳喜欢算账,他曾说13亿人口是中国的一个大“包袱”,但办好教育,这个“包袱”就会变成财富。因而,田家炳最愿意去那些经济差、地方远、交通不便的地区助学,守住偏远地区的琅琅书声,成了他人人生最大的寄托。

田家炳办学的过程基本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步。此前,海外企业家这一身份,被视为一种“麻烦”。直到1979年,田家炳才有机会到内地“做教育工作”,他把第一笔善款捐给了家乡梅州大埔县。在那里,他修马路,建桥梁,成立了第一所田家炳中学。在以风水祖地为重的广东,田家炳为配合家乡建设,竟然动迁了祖坟。

对田家炳来说,年少辍学的经历有多遗憾,他就多不愿看到遗憾在下一代年轻人身上重演。每建一所新学校,田家炳都尽可能赶去给学生“打气”。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人会为孩子们讲些“脚踏实地”的故事,因为“捐赠的目的是育人,而育人最关键的是‘育品德’”。面对受捐学校的感谢,他也有自己的回应方式,他会鞠躬躬对老师说,“我捐钱盖了楼,不用你们感谢我,你们把我捐资的学校办好,我还要感谢你们”。

有时,田家炳苛刻得像像个工头。10年前,田家炳基金会一次性给连云港市田家炳中学资助200万港元,用于新建一座教学楼。田家炳亲自审核了教学楼的图纸,包括大楼的楼梯设计以及卫生间的设计他都有要求,校方一位领导回忆,“老人专门强调这些设计要人性化,要注重方便”。

比起做慈善时的一掷千金,生活中的田家炳素有“吝啬”之名。亿万富翁的他每月花销不足三千元,八大寿没有摆酒,一双鞋穿了10年,袜子补了又补,出差住宿,还要自带肥皂。他偶尔也讲面子,戴了多年的电子表款式过气了,戴出来示人有失面子,他就把表装在口袋里。田家炳知道,这些都是小钱,但小钱也有大用处,因为可以用来为孩子、为国家、为民族做事。

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,香港经济受到重创,田家炳对外承诺的捐资一时难以兑现,遂决定卖掉在九龙塘高档住宅区占地900余平方米的大别墅。别墅售价5000多万,捐给了二十多所中学。卖掉别墅影响他的生活,他原本就像极了工薪族,没有专车,每天坐地铁上班。改变在于,卖掉别墅后,房租就成了其日常最大的支出。

比起很多慈善家,田家炳的知名度要低不少。不过,田家炳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,行善40年,他虽不是捐钱最多的慈善家,但把总资产80%都用于慈善事业,全中国只有他一人。他自己也说,“我虽然不是最有钱,但我一直在尽自己的绵力。钱财都是身外物,特别是看到一栋栋教学大楼拔地而起,听到万千学子的读书声,精神上的享受也比物质上的享受好得多。”

社会给予田家炳的回馈不止读书声。初中未毕业的他戴过数十所大学的博士帽,他的头衔还包括荣誉教授以及院士,同时还是几十个县市的荣誉市民。留下他名字的教学楼更是不胜枚举,在全国范围内,有93所大学、166所中学、41所小学,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受到过田家炳的资助。

远离故土漂泊一生的田家炳,最终用教育实现了对故土及祖国的回馈,前半生实业兴家,后半生教育报国。在他身上,以宗族为纽带的乡土情结逐渐被教育的大同理想所取代,在他的眼里“全国的‘母校’是一个大家庭”,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,所有人都应“相互策力,用好基金会的平台,用良心办教育,培育学生成才”。

无法统计有多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成人成才,但当这位老人在7月10日走完他99年的人生时,无数现在或曾经的学子为他点燃了蜡烛,那些错将他当成校友的善意故事,那些在以他命名的楼里读过的求学时光,此刻都变成了一句感恩和缅怀:我们学校也有一座田家炳楼。

人物志

学校里有座田家炳楼

赵祺姝



年轻时的田家炳

「短史记」

「垃圾奏折」的作者未必是蠢臣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